

政府不是閹豎

● 陳克艱



何清漣：《現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

《現代化的陷阱》，這本書名叫人嚇一跳的厚書，還有一個副標題：「當代中國的經濟社會問題」，這就比較文題相符了。書中對改革以來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觀察，視野很開闊，舉凡土地權問題、國企改制問題、貧富差距問題、人口問題、就業問題、犯罪問題，以及腐敗問題、市場失範問題、地下經濟問題、黑社會問題、農村宗法勢力問題，等等，都有相當充分的展開，材料的挖掘也有深度。作者何清漣精力充沛，筆耕行路都很勤

快，除了豐富的文字資料之外，東奔西走實地調查得來的材料也復不少，使我們坐井觀天的人，一卷在握，就能了解到許多天下大事（包括有大意義的小事），平添一份憂國憂民的情懷，這是本書主要的好處。

但是，作者把解決上述所有問題的責任和權力都交給政府，要求政府以「公平和正義」為「阿基米德支點」，通過在倫理意義上把社會制度向上提昇來完成改革大業，關於這個宗旨，就大有可議之處了。奇怪的是，作者在〈導論〉裏花了不少篇幅談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的公共選擇理論，隱約有步武其後對所論問題作類似的「政治經濟學」分析的願望。然而，願望歸願望，行動歸行動，行動反願望之道而趨之。作者似乎一點都沒有意識到：她向政府交辦的那些任務，她給政府規定的那些目標，是與公共選擇理論關於政府本性的看法直接相矛盾的。

公共選擇理論的精義，可一言以蔽之：「公僕不是閹豎」（civil servants are not economic eunuchs）。公僕有他自己的利益興奮點和快感追求。更何況，局面裏的問題本身就是公僕的逐利行為造成的，卻希望通過寫書進言，教育他、說服他，令他突然改變方式和狀態，從此行動舉措一以正義和公平為目標，這豈不是要求一個性欲亢奮、性能強

《現代化的陷阱》的作者把解決所有問題的責任和權力都交給政府，要求政府以「公平和正義」為「阿基米德支點」，通過在倫理意義上把社會制度向上提昇來完成改革大業。關於這個宗旨，大有可議之處。

大的漢子，做愛做到一半，卻捨己為人，戛然而止，恭敬謙讓，全身而退？又豈不是要求一塊橫掠遼天、直撲地面的隕石，毫沒來由地突然轉向，飛升而去，萬有引力，竟歸無效？

何清漣也引了一些布坎南的語錄，例如講政府中人和平常的男女一樣也是有七情六欲的理性經濟人；又如講只為公共利益、並且有能力為了公共利益做一切好事的「政府概念」乃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浪漫主義」，等等。但是她把這些深刻洞見事物本性、客觀規律性的認識，僅僅當作「經濟決策的政治基礎」，當作技術性的知識來看待，希望通過運用規律而克服規律，最終仍然將浪漫主義的政府概念變成現實。她說：「公共選擇理論對我們最大的啟發就是今後如何優化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制度環境。」「考慮到在政府部門中擔任公職者也是『經濟人』這一前提，就必須對通過市場前分配權力來創造經濟價值這一權力尋租行為加以強有力的限制。」問題是：誰來進行優化？誰來實施限制？何先生的意思若曰：存在着一個主體，既「強有力」，又極仁慈，願意並且能夠做成一切好事，消滅一切壞事。何先生這一部「只向政府決策提出理想化目標卻忽視其制度結構」的「政治經濟學」，恰恰是公共選擇理論所要批評和摒棄的。在民主與科學並提的口號下，人們確實很容易把政治的意義定位在設計正義藍圖、追求理想目標上，類似於科學之追求真理，關此，布坎南說得很嚴厲：「當政治被錯誤地解釋為類似於真理發現過程的科學時，那些聲稱自己擔負着啟蒙任務的人也許會給實行強制找到道德上的合理性。

相反，當政治被正確地解釋為解決個人利益衝突的過程時，那些企圖把自己的偏好強加於人的人就沒有道德上的優越性了。」「如果政治活動被解釋為類似於科學活動，那麼就存在一種專制的可能性。」

公共選擇理論最重要的方法論立場是：通過分析制度結構來了解政治決策和運作的過程。對於一個政策目標，首先不是評論它應該不應該，而是看它是如何產生出來的。何先生大聲疾呼「一定要放棄那種以效率優先為目標、沒有發展的經濟增長戰略」，「理直氣壯地宣稱，平等是一個應該付諸實施的政策目標」。但是試問：「效率優先」是不是一件可以高高舉起又輕輕放下的東西？是不是一個隨意浮現又可以隨時抹去、隨時塗改的想法？不是！只要稍許留心，在中國大陸，到處都能看到使數量原則通行無阻、不可抗拒的制度力量的作用。舉個小例，當着考試制度、升學制度、就業制度、教師的收入分配制度，在在都逼着學生以考試分數為命根的情況下，煞有介事地討論用「素質教育」代替「應試教育」，不是很虛偽嗎？果不其然，彷彿鬼打牆一樣，實施「素質教育」終於又落實到「對素質教育的成果也要考核打分」，原形畢露。所以，先別忙着主張for what，經濟分析的任務首先在於揭示出because of what。

弗里德曼 (Milton Friedman) 襲用老凱恩斯 (John N. Keynes) 作過的區分——「實證科學」(positive science) 之與「規範科學」(normative or regulative science)，也把經濟學分為「實證經濟學」和「規範經濟學」兩部分。他說：「實證經濟學是一門『客觀』的科學，和任何一門物理科

何清漣大聲疾呼「一定要放棄那種以效率優先為目標、沒有發展的經濟增長戰略」，理直氣壯地宣稱，「平等是一個應該付諸實施的政策目標」。但是試問：「效率優先」是不是一件可以高高舉起又輕輕放下的東西？

學同樣客觀。」他當然也考慮到經濟學處理的是人類事務，而研究者本身就是人類的一部分，不像物理學家那樣可以置身事外。但他認定，這一點區別並不深刻，並不在方法論基礎上構成實證經濟學與物理科學的裂痕。在實證經濟學的範圍內，就像在物理學的範圍內一樣，行家們的看法是相當一致的。拿公共選擇論來說，它作為一種「新政治經濟學」，其新穎性並不在於提出了新的價值主張和新的關懷，而在於它第一次用物理學那樣客觀的眼光來看待政治運作過程。弗里德曼雖然不是「公共選擇派」，也不是「新制度派」，但他論到有關問題，卻有同樣的思路。例如，「規模經濟」問題，「純」經濟學把它看作生產函數的極值問題：任何產業都有一個特定的規模可使其效益最優；但規模超過限度，也會出現「規模不經濟」。弗里德曼則採取了「政治經濟學」的觀點：「所謂的規模經濟，對其重要性存在着不同的預見。其實它們反映的是另一問題上的分歧：對產業實行嚴密的政府管制甚至搞社會主義，比之搞私人企業，何者更可欲，更必要？」說白了，拼命鼓吹「規模經濟」的人，實際上是以政府管制甚至是以計劃經濟為其利益立場的，並非真的在追求最佳效益，怪不得他們總是越大越好，從來沒有聽他們說起過也可能「規模不經濟」。

何先生的書對中國經濟學的現狀多所批評，主要有兩點：一是「沒有良心」，竟然說甚麼「腐敗是消解舊體制力量的最佳選擇，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何先生頗恨經濟學家對生民毫無同情：「迴避國有企業對職工的歷史債務，去談國有企業

頭上的三座大山。」等等。二是「只注重編製數學模型，陷入數學觀點的方法論陷阱，成為一門嚴重脫離現實的屠龍術」。簡言之就是關懷少了，數學多了。然而，這兩點未免都是皮相之談。數學是一種表達力很強的語言，經濟學用到數學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問題不在於多少，而在於用得恰當不恰當。本人見到過一本得獎的「經濟學專著」，把大學初級生的微積分習題都收進去，以充篇幅。這難道能說是在「用數學」？只能說是在「賣野人頭」。這難道是「屠龍術」？恐怕連水果刀都比不上。可笑的是這種情況相當普遍。至於「關懷」，實際上一點都不少。所謂關懷，無非是關懷利益，為某種利益作辯護。我們這裏的經濟學文章，動不動就做成了策論，這恰恰是關懷太多的表現。

還是弗里德曼的理路清晰：有實證經濟學，有規範經濟學；後者雖擔任政策建議的任務，但仍須以前者為基礎；決策需要預見，一個政策將會有甚麼後果，這仍有待於實證經濟學來回答。只因為決策及其後果之間並不是一一對應關係，所以才會有不同的規範經濟學。弗里德曼把規範經濟學方面的分歧，很細心地與「基本價值」方面的不同區別開來，他似乎認為：為某種基本價值而奮鬥的「經濟學」，就不是經濟學了。這最後一點我們可以不同意，但他的觀察方式是如理平實的。以他的方式來觀察，這裏的情況只能說是：實證經濟學太少了，規範經濟學的實證基礎太少了，而有價值關懷的經濟學又太多了。「腐敗有用」的策論確實「沒有良心」，何先生於是寫了一本軟心腸的書，但這裏缺的是硬心腸的實證經濟學。

何清漣對中國經濟學的現狀多所批評，主要有兩點：一是「沒有良心」，二是「陷入數學觀點的方法論陷阱，成為一門嚴重脫離現實的屠龍術」。然而，這兩點未免都是皮相之談。這裏的情況只能說是：實證經濟學太少了，規範經濟學的實證基礎太少了，而有價值關懷的經濟學又太多了。